



金佛夕陽

# 我的一九四九故事：

中國青年黨遷台與我家的遭遇

劉成均

Clark C.K. Liu [clarkliu@hawaii.edu](mailto:clarkliu@hawaii.edu)

# 我的一九四九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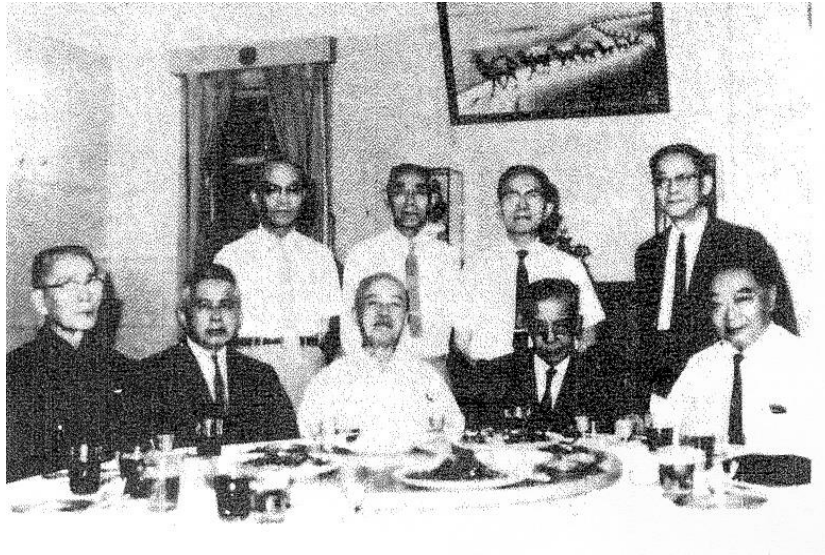
## 中國青年黨遷台與我家的遭遇

劉成均

1949年前後，兩百多萬軍民隨國府遷居台灣。他們當中有很多是單身赴台，其餘的也大都有親人留在大陸。兩岸分治後，不少美滿的家庭被活活拆散。生離死別之中，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發生在身歷劇變的這兩百多萬軍民身上。我在此寫下中國青年黨中央黨部在1949年年底遷往台灣的經過及因此而造成對我家的一些重大的衝擊。海峽兩岸分治迄今已六十多年，願此文能成為一個小人物對這中華民族歷史上重大事件的見證，也願用此文追念我所親愛的父母親。

中國青年黨以國家主義，全民政治為宗旨，於1923年12月2日成立於法國巴黎。青年黨和民國初年的學術社會團體少年中國學會有密切的關係。創黨初期之青年黨黨員包括曾慕韓(琦)，李璜，左舜生，張夢九，劉泗英，陳啟天，余家菊等皆是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少年中國學會以“發展科學，服務社會，以建立少年中國”為其宗旨，並發行“少年中國雜誌”廣為宣傳。後來因為會員間政治理念不同而導致學會解散。少年中國學會自成立到解散不過短短的幾年，會員人數也只有100多人。但是少年中國學會對中國近現代史的影響很大。早期中共人士，包括李大釗，張聞天，毛澤東，惲代英等，也曾經加入過少年中國學會。隨後的歲月中，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為了政治理念不同而鬥爭。不過少年時候那種純潔的友情及共同擁有的那一個建立少年中國的理想，則多多少少一直保存在會員們心中（附圖1）。

附圖 (1) 1967 年少年中國學會會員聚於台北。後排左起湯元吉,劉泗英,沈怡,方東美;前排左起余家菊,陳啓天,張夢九,左舜生,雷寶華



中國青年黨反對共產主義,反對一黨專政。因此由巴黎遷回國內後就受到共產黨和國民黨兩黨夾擊,只能以“國家主義青年團”的名義祕密發展,創黨初期的黨員多任教於各大專院校,所以發展的對象是以這些院校的學生為主。1937年抗日戰爭開始,左舜生代表該黨和蔣介石商談並簽署共同抗日聲明。此後即正式以中國青年黨名義公開活動,並在社會各階層廣召黨員,擴大組織。

抗戰勝利後國府在陪都重慶召開政治協商會議。還都南京後,國府即根據協商達成的決議進行制憲,行憲,以求還政於民。在這些事情上青年黨皆積極參與,並有很多黨員獲選進入第一屆國民大會和立監兩院。1947年5月國府組成聯合內閣,並由青年黨黨員陳啟天和左舜生分掌經濟,農林兩部。此時,青年黨已成為國共兩黨之外的第三大黨。但好景不常,國共內戰隨即全面開打,戰火自關外一直燃燒到華南,華西。八年抗戰後,歷經劫難的小老百姓盼望在廢墟中重建家園的美夢被這殘忍的現實完全粉碎。內戰中節節敗退的中華民國政府也終於在1949年年底撤離大陸,退守台灣。

以知識份子為主的青年黨,其中央黨部是如何遷至台灣的這一段經過,可能知者不多。最近讀到楊伯安所著“風雨八十年”一書。楊伯安在抗戰前就讀清華大學時加入青年黨,並曾在清華畢業後擔任青年黨北平(京)市黨部主任委員。他的夫人王文濤女士畢業於燕京大學,也是青年黨黨員。在“風雨八十年”一書中,楊伯安記載了他以青年黨中央委員和制憲國民大會代表的身份,和夫人在國共內戰期間跟隨青年黨中央黨部由南京,而廣州.而重慶的經過。書中對於他們到重慶後,以至於來到台灣的一段經歷,更有生動的描敘。

1949年8月,楊伯安和家人到了重慶。由先父劉泗英介紹他到設於江津縣的省立四川中學教英文。對於其後發生的事,“風雨八十年”一書中有如下的記載:

*十一月底,我在四川中學接到文濤的快信,叫我立刻回去。我趕回黨部,秘書長王嵐僧同志,已經準備宣布緊急措施了。他說:“現在本黨已經形同解散,沒有黨部了。今天下午,我就要跟顧祝同將軍走,重慶危急,你們各尋生路去吧”。這幾句話,說得在場同志,面面相覷。青年黨就這樣完了嗎?正在你一言我一語長吁短嘆的時候,忽然劉泗英同志闖進來,他已向西南毛織廠廠長沈亞尼同志借來運貨大卡車,並已貼了省政府通行證,大叫大家趕快上車,逃往成都。*

*這裏還有一件極為感人的故事,使我至今不能淡忘。那是泗英同志在此次撤退中,又一次表現的勇於負責,勇於助人的義行。車到沱江,江上沒有橋,全憑幾隻渡船往來接運。本來我們的一大一小兩部汽車,已經看到江邊,不須多久,就可以過去了。但是,泗英先生看見後面那無窮無盡的車輛,只靠這幾隻船,不要過上幾天幾夜?他為別人急了。當時天還下著不小的雨,他顧不得天雨路滑,一個人跑到內江縣政府,以省政府委員身份,請縣長即刻多徵船隻,幫助接運。等他撐著雨傘,坐著滑竿回來後,江上也增加了不少渡船。*

*到了成都我和家人借住在張伯倫同志家。第二天到泗英同志家打聽消息。據說政府原想再遷西昌,現在已經決定完全撤出大陸,退守台灣。大家都急得如熱鍋上的*

螞蟻，彷彿到了世界末日。其實，對我們這些囊空如洗的外省同志而言，真是到了世界末日。能跑的路都跑完了，除了會飛，只剩死路一條。

第三天上午，我們又去劉府，泗英同志不在家。文濤想乘閒出城走走，去看看響往已久的武侯祠或者杜甫草堂遺址。我說：“不能出城！我似乎有預感，我總覺得這幾天會有意外的好消息。還是回伯倫家去等著吧。”將近黃昏，忽然有人來找伯倫和我到劉府集會。到了青石橋劉府，果然好消息來了，台灣已派來飛機，撤退在成都的政府官員和國、青、民三黨的黨務人員。分配給青年黨的票不多，所以經祕書長決定，以滯留此地的中央委員為限。

我一聽，糟了，我是中央委員而文濤不是。我即刻跑到伯倫家，把詳情告訴文濤。她說：“能全家一起走，自然最好；即使不能，你也要走。只要你能逃出去，即使是永別，也比我眼睜睜看著你被殺害好過些。”她忙著給我收拾兩件簡單行李，一同趕到劉府。泗英先生正在客廳，開口就問：“你們夫妻倆，怎麼只帶這點點東面？”文濤說：“我不是中委，不能走，是來送他的。”只聽裏邊傳來余家菊先生的聲音說：“甚麼中委不中委，你不走怎麼辦？快去拿東西！”我說：“我們還有兩個小女孩。”他說：“一起帶來。”泗英先生說：“快走，快去快來！一過九點鐘，各街口的柵欄一關，就不能通行了。”

趕回劉府，還不到九點鐘。這時候客廳裏已經聚了不少人。有等待上飛機的中委，也有省黨部的同志想候缺同走的。1949年12月6日黎明，一部卡車，駛進新津機場，我們登上飛機，從此離開了錦繡大陸。

楊伯安這一段回憶對青年黨中央黨部遷台經過作了生動的描敘。讀後，我深深地為他和他的家人能逃離戰火籠罩下的成都而慶幸。不過，我還想作些補充。因為在那段往事的背後，有一個小男孩，也就是我。六十年過去了，1949年年底青年黨中央黨部自成都遷往台北這一件事就中國近代史來說或許並不重要，但是對我和我家來說則是一件極其重要的往事，我有許多話要說。

我的 1949 故事要從 1945 年第 2 次中日戰爭結束說起。那時中華民國經過 8 年浴血苦戰取得勝利,並成為世界五大強國之一。次年國府自陪都重慶還都南京,我們一家隨後也由重慶遷到上海(附圖 2)。那時父親擔任經濟部次長兼全國紡織調節委員會主任委員,經常奔波於上海,南京之間。後來內戰情勢逆轉。如何保有西南一隅又成各界關注的焦點。青年黨中央決定由父親回到四川,協助政府進行政治革新,組訓民眾,以穩定大後方。正好那時國府要擴大聯合政府體制從中央到各省,並邀請青年黨參加省政府。因此家父接受了行政院任命擔任四川省政府委員兼訴願委員會主任委員。我們一家隨即在 1948 年由上海遷回四川成都,並住在青石橋四川省政府附近一座租來的房屋。

附圖 (2) 1946 年全家福攝於重慶。筆者坐於父母親中間,其時幼妹猶未出生



父母親生養了我們九個兒女。父親在 1949 年年底赴台時沒有帶走一位家人;包括我,也是他寵愛的么兒在內。他當時帶走的只是一本家譜和多封尚待回覆的信件。多年後,父親將家譜重印了多份分給各地的子女。至於那些信件則裱印成冊交由我保管。

父親多年後告訴我,成都撤守前蔣介石以國民黨總裁身份派人來我家並交給父親一批飛機票。蔣介石要父親盡力安排滯留成都的青年黨中央委員和其他重要幹部赴台。蔣介石深知在政府撤往台灣後必須要維持法統和多黨政治架構。父親當時接受此一任務時所面臨的情況是機位有限但要撤離的人多,而且大家都不忍心拋棄家人單身赴台。父親和母親商量後作了一個非常困難的決定:父親率青年黨中央黨部赴台灣,而母親和九個子女都留在即將淪陷的成都。

1949年年底青年黨遷台後,父親擔任中央黨部祕書長。蔣介石在台恢復總統職位後聘父親為總統府國策顧問。在那段日子,政府常安排父親和訪台的外國友人見面晤談,以彰顯朝野一致抵抗中共的決心。後來並邀請父親擔任中華民國代表團顧問,參與在台北舉行的中日合約談判。因為日本方面的堅持,中華民國的代表團除了外交部長葉公超以外全是以顧問身份參與合約談判。中華民國雖然是戰勝國,但中央政府已失去大陸的管轄權,退往台灣一隅。以至在談判中,中華民國並沒有能發揮戰勝國應有的優勢,談判過程充滿艱辛。父親多年後回憶當時情形仍不禁嘆息:“八年艱苦抗戰,結果是日本慘敗而中國慘勝”。20年後,日本單方面廢止與中華民國簽訂的合約,重新和中共在北京談判。令人不解的是,中共和日本在1972年所簽訂的新合約,其內容若與台北合約比較,對整個中華民族而言並沒有更為有利。

國府在遷台初期處於風雨飄搖之中。青年黨,民社黨這兩個小政黨和國民黨通力合作,維持多黨政治架構。在台灣中華民國政府因此能在島內外以自由民主為號召。這對於穩定當時危局,讓中華民國政府能渡過那一段艱困的日子,發揮了相當大的作用。當時青年黨在台灣中央黨部及地方黨部人材濟濟。除了來自大陸各地的黨員外,更有包括李萬居,郭雨新,黃順興,蘇洪月嬌在內的許多本省籍菁英。

留在成都未能撤離的青年黨人士大多遭遇悲慘。解放軍進入成都後展開“鎮壓反革命運動”。很多未能逃離的國民政府黨,政,軍人士被捕,甚至喪生。這其中包括了很多青年黨黨員。這裡只提發生在一位青年黨黨員伍道遠身上的事。

伍道遠在國軍撤走後,組織游擊隊和解放軍對抗。並曾不顧自身安危拯救羅列將軍。羅列原是胡宗南部隊的參謀長,參與了國共內戰最後一戰的西昌戰役。西昌撤守之際,羅列統率了長官部一部份的官兵和部隊在後擔任掩護,奮力抵擋解放軍的攻擊。最後彈盡援絕,全軍覆沒。當時伍道遠和他帶領的反共游擊隊仍活躍於川康邊界的叢山峻嶺中。伍道遠在難民群中找到了身負重傷的羅列。將他救出療傷,並一同繼續和解放軍對抗。後來伍道遠被俘,遇難。他在遇難前囑託妻子設法幫助羅列逃出。羅列到達台灣後,即前往青年黨中央黨部告訴家父他和伍道遠一同從事遊擊戰,以及伍道遠於1950年11月被中共處死的前後情形。他並致上對青年黨的感謝。在台灣羅列將軍曾擔任軍團司令和陸軍總司令等重要軍職。後來羅列曾撰寫一文詳細敘說其中經過及伍道遠的義行。該文發表在傳記文學雜誌1963年出版的第52期上。

由於很多內在和外在的複雜因素,青年黨沒有能在台灣成為一個有力的反對黨。1951年5月7日青年黨的精神領袖黨主席曾慕韓病逝美京華盛頓。在台北的追悼會召開後的次日,就有部份黨內同志以革新為名另成立中央黨部。自此,在台灣的青年黨就陷入長期分裂的局面。那時父親身歷和家人離散之苦,又面臨黨的分裂之痛。失望之餘,他未再積極參與黨務。不過對於昔日患難與共的同志,不論是那一個派系,他都一直保持良好的友誼,時相往還。

現在再回頭看看淪陷在成都的家人情形。



成都淪陷後,中共堅持將父親名字留在我家的戶口簿上,並加註“已逃台灣”幾個字。就這樣,母親和我們子女都成了“反革命份子家屬”。那時候九個兄弟姐妹都還需要仰賴家中照顧,最年長的大姐也還只是四川大學的學生。雖然父親在教育界,金融界,和政界工作多年,但家中從未有多的積蓄。一旦沒有薪水,很快就生活無著。我還記得當時陪着母親佇立在寒風中成都街頭的情景。那時候街上有很多人在變賣舊物。母親也擺上地攤,出售衣物和家中用品來換取生活費。我最不能忘懷的是眼看著有人付了錢拿走了一件小孩毛大衣,那是一個多月前父母親給我的7歲生日禮物。

當時母親要承受的還不僅僅是經濟上的壓力。母親多年在家照顧子女,未曾在外工作。因此中共沒有將她列入“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鎮壓的對象。不過她多次被強迫參加公審大會,親眼看到一些青年黨幹部及親友遭受公審,有些並當場處決。在那段日子裡,母親情緒大受打擊,曾萌發輕生的念頭。不過看到身邊的子女,她知道她必須挑起重擔,堅強的活下去。

中共政權成立之初,各級政府皆容納了一些親共的黨外人士。成都市副市長一職當時就是由著作“死水微瀾”的名作家李劫人出任。李劫人是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也是家父的好友。母親在走頭無路的情形下,去求見他。李劫人當即表示願意全力幫助。他向母親說,“你原是江浙人,還是帶了子女去上海比較妥當”。後來他為我們一家安排路條,並致送到重慶的旅費。他還建議母親到了重慶後去找民生輪船公司的盧作孚。

盧作孚也是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他和家父早年曾一同任教於成都的西南公學,彼此情誼深厚。後來盧作孚創設了民生輪船公司並立志打破西方強權壟斷長江航運的局面。民生公司是從幾條小船起家。後來規模日漸擴大,船隻數目和客貨量都超越了外資公司。抗戰初期,民生公司的船隊在盧作孚親自指揮下搶運沿海地區的戰略物資,工廠設備入川。這項成就被譽為“東

方敦克爾克大撤退”。抗戰勝利後民生公司已是一個擁有近百艘大小輪船的大企業,公司業務也遍及長江及沿海各港埠。1949年年底,盧作孚已到了香港,也有前往台灣的打算。但是他捨不得辛苦經營多年的事業和須他照顧的員工,在中共全力遊說之下,他回到重慶主持民生公司。

母親在1951年夏天帶著我們子女離開了成都。到了重慶後,母親即去民生公司訪盧作孚。盧作孚親切接見母親。晤談後,立即安排我們全家搭乘到上海的“烏江號”貨輪。自重慶順流而下的7天航程中我們全家受到船員們很好的照顧。我現在還記得無意中聽到船員們在聊天。有人說:“這一家子是青年黨劉泗英的眷屬,要好生照顧”。父親早年自海外學成歸國後就返回家鄉服務,重慶市頗具影響力的報紙—新蜀報,就是父親和少年中國學會會友陳愚生在1921年創辦。父親並擔任新蜀報第1任總編輯。直到1949年年底赴台為止,父親的事業中心都是在四川。由於樂於助人,他和家鄉各界人士相處融洽。也因為如此,我們家人在陷入困境時能得到他人的幫助。在此我想要提到,盧作孚在中共統治下經營民生公司並不順利。更不幸的是他在後來的“三反,五反運動”中受到冤屈。他不堪受辱,於1952年2月8日在重慶自宅內自殺身亡。

1951年抵達上海後我們一家人就住在亭子間和閣樓兩個小房間,日子過得很辛苦。即使如此,母親仍盡力讓我們子女繼續學業。我先後完成了在江灣路小學及新滬中學初一的學業。在學校裡我努力求學,和老師同學們相處得很好。在江灣路小學時,老師曾派我參加校外的演講比賽,也派我代表學校參加上海市虹口區兒童合唱團,我並在合唱團第一次練唱時被選為團長。不過那些年裡,我和家人因成份不好都承受很大的壓力。出身於反革命份子家庭這件事,在那段歲月裡就像一片烏雲常籠罩在我的頭上。偶然也會有成份好的同學,在爭吵時會用不屑的口氣對我說,“也不想想你爸爸是幹甚麼的,還敢和我爭”。我也就只好啞口無言了。

1957年,母親帶著年幼的子女,包括我在內,輾轉到了台灣和父親團聚。其餘的子女則從此失去了父親和母親的庇護。這些留在大陸的兄弟姐妹們都飽受打擊,其中二姐和小哥的經歷最具代表性。

當我們全家在1951年到達上海後,生活無著。二姐那時高中尚未畢業,為了照顧弟弟妹妹們,他進入在虹口的一所電工廠擔任技術員。她求學心切,暇時仍努力閱讀自修,尤其喜歡閱讀和藝術有關的書籍。1956年上海製片廠(上影)公開招考演員。在眾多的考生中僅錄取男女各一人。二姐獲得錄取進入上影。後來她被分派到由上影分出去的天馬電影製片廠。進入上影不久,二姐被派參加了上影演員劇團公映由巴金名著“家春秋”三部曲改編成的話劇,擔任配角。其後她參加了好幾部新片的演出。二姐在上影時受到許多成名演員的賞識。二姐曾告訴我們,在那些成名的演員中,上官雲珠對她最親切,指導照顧她也最多。可惜這些成名演員隨後都遭受到迫害。二姐也受池魚之殃,加上成份不好,工作調動時她總是被派到最不理想的單位。1957年夏天我們離開上海以後不久,二姐就與上官雲珠等一同被派到上海郊外農村參加勞動,然後她被調到江蘇省話劇團,最後在文革期中她被下放到揚州柴油機廠擔任女工。

1980年我們在海外的親人和二姐取得聯系。那時她已結婚並有了兩位聰明可愛的兒子(附圖3)。但不久我們就得到她罹患乳癌的不幸消息。我隨即在1981年夏天自美國趕往揚州看望。那時她病情轉劇,醫生已放棄治療,要她回家休養。由於聽到我代表海外親人要到揚州看望,醫院方面才安排了病房讓二姐繼續住在醫院裡。我抵達後,院方召集所有曾參與治療的醫生們,向我簡報治療的過程。我想信他們在治療上已盡了心力,也代表海外親人向院方和醫生們致謝。

附圖 (3) 2010 年 10 月與外甥樂巍(二姐的兒子) 在故鄉南川 2000 多公尺高的金佛山山頂



那段時間裏,我每天到醫院陪二姐。她仍能講話,我們一起回憶兒時的種種趣事,談談各地親人的近況。二姐病重時很想再和父母親見一次面,再當面叫一聲“爸爸,媽媽”。她這一個願望,我沒有能幫她達成。至今想到當時的情景,仍覺心痛不已。在和二姐相處的那段日子裡,我向她傳基督的福音。上帝的愛和對永恆的盼望帶給她很大的安慰。但二姐的病情沒有好轉,不久就離開了這個世界。那時她才 40 多歲。

小哥只長我兩歲。我們曾一同就讀於上海江灣路小學,兄弟之情最深。母親到台灣後,小哥由二姐照顧並於 1960 年完成高中學業。那一年全國各高等院校擴大招生,錄取名額增加很多。小哥以優異成績自上海的一所重點中學畢業。但是在幾乎全班同學都榜上有名的情形下,小哥名落深山。次年再考,仍榜上無名。那時大姐已自四川大學畢業,並在北京師範任教。她托人向高考辦事處打聽。他們沒有告訴原因,只是要她轉告小哥不要再報考了。

小哥在隨後“自然災害”期中到了揚州。那時候二姐一家也常在缺糧狀態,所以小哥常挨餓。多年後,小哥向我說,他能活過那段日子是觀音菩薩救了他。我問他到底是怎麼回事。他說那時候每戶農民家中的牆上都掛著毛澤

東像，並須時常面對此像鞠躬敬禮。可是晚上很多農民會偷偷換上觀音菩薩像來拜，所以觀音像很受歡迎。小哥也知道膜拜那些用人手繪製的像不能解決“自然災害”；不過他為了活命就努力繪製觀音像，並以此向農民換取少許糧食。

後來眼看實在沒有辦法活下去。小哥給周恩來寫了一封信。在信中他介紹了自己的家世。並說父親“已逃台灣”，他不能上大學，又不能找到任何工作，已在餓死邊緣。不久，揚州地區的一位領導找小哥去談話。並向他說周總理日理萬機，這種小事情直接向他們說就可以，何必去打擾總理。隨後就派小哥到國營揚州農機工廠工作。小哥從小在學識和做事能力上都遠遠超過我。不幸的是他生活在一個注重家庭成份的社會。所以他在退休前幾十年裡唯一曾做過的工作就是農機工廠的工人。

1957年8月11日清晨，母親帶了我和兩個妹妹自香港乘船到達台灣，在基隆碼頭我們見到了分別近8年的父親和其他親友。但隨後早已等在碼頭的保安司令部人員很禮貌的和父親打了招呼然後就請母親跟他們去問話。母親在保安司令部得到很和善的招待，但他們堅持要母親說出中共究竟交給了她甚麼任務才准許我們來台。母親自然沒有任何事情可以告訴他們。當天晚上直到總統府祕書長張群親自打電話去表示關切後，母親才得回家。國共內戰，受苦難最多的是夾在其中身不由己的善良老百姓。

母親帶我們抵台後，中國青年黨同志數百人在台北靜心樂園設宴歡迎。母親請父親代筆即席寫了下面一首詩以為紀念：

*十年離亂喜團圓，海外欣瞻祖國天。一井自投慚不死，萬家俱毀幸能全。  
思親正值孟蘭節，教子重溫漢曆年。大陸沉冤君莫問，為防涕淚落樽前。*

父母親一生遭遇很多憂患。所幸晚年能享安康。到了台灣以後,他們就沒有再涉足所愛的故鄉 - 四川南川 (現已劃歸重慶市)(封面圖及附圖 3)。但是他們曾多次接受子女邀請到香港,日本,新加坡,美國,加拿大各地小住。1984 年我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任教,高齡的父母親相偕來看望我們。那時父親已九十高齡。我去機場迎接。當我看到父母親相偕攜手走出機場入境大廳的那一時刻,一股暖流流過全身,心中充滿著感恩。1986 年分散各地的子女和海內外親友齊集台北為父母親慶祝結婚六十年 (附圖 4),父親好友李璜親臨致賀。1993 年子女和親友再度齊集台北為父親晉百歲慶賀,四代同堂,並有包括陳翰珍,黎玉璽,陶伯川在內的多位友人參加了壽宴 (附圖 5)。

附圖 (4) 1986 年子孫們為父母親慶祝鑽石婚於台北。右圖為中國青年黨主席李璜致賀詞



附圖 (5) 1993 年父親百歲壽宴於台北。右圖坐在父母親之左為陳翰珍,右為黎玉璽



1995年8月30日父親在台北去世,享年101歲。父親去世後舍妹逸君迎養母親於加拿大東部的柏靈頓市。各地子孫每年都前往團聚。母親於2004年6月26日在柏靈頓市去世,享年97歲。

回頭看去,父母親眾多子女中我可以說是最幸運的一個了 - 在1949年的大動亂期間我一直在母親身邊,1957年又能跟隨母親到台灣和父親重逢。

到了台灣後我被分發進入台北建國中學就讀。先去拜見賀翔新校長。賀校長非常親切地接見我。他仔細地聽我敘說了求學的經歷,然後向我說:“你剛在匪區唸完初一,建中程度高,你最好從初一再唸起”。我請求賀校長給我一個機會。讓我先在初二唸一學期。若跟不上進度再留級。賀校長答應了我的請求。台北建國中學的初中課程,無論在內容和進度上都與上海新滬中學很不一樣。尤其是歷史課,課本上對於歷代發生的重大事件幾乎都作相反的評述,我必須努力調整以前所學才不致於犯大錯。一學期後我僥倖的在班上名列前茅,消除了留級之憂。兩年後我參加台北市五所省立高中的聯合招生考試,以高分考回建中。1962年高中畢業參加大專聯考,很幸運得以考入國立台灣大學農業工程系水利組。我很早就有從事水利事業的志向,當時農工系內有好多位優秀的教授,他們學養深厚。而且都曾在大陸及台灣主持過大型土木和水利工程。他們在教學中能將理論和實際作最佳的配合,因此台大四年我唸得很愉快。

當時所有的男性大專畢業生都須服兵役;先接受入伍訓練和分科教育,然後入部隊擔任少尉預備軍官。我在大學畢業後,應召進入憲兵部隊服兵役。自軍中退伍後,取得密西西比大學助教獎學金來到美國,攻讀水資源和環境工程,並先後在密西西比大學和康乃爾大學完成碩士和博士學業。我感謝密西西比大學提供了我來美深造的機會。我更感謝密西西比大學在我完成碩士學位的40年後邀請我回校,頒給我2009年度的傑出校友獎(附圖6)。

附圖 (6) 2009 年 4 月 16 日在密西西比大學接受傑出校友獎,並在頒獎典禮上致詞



在台灣,我在父母親和多位良師恂恂教導下成長。另外又結交了很多可以切磋琢磨的好友,讓我能打下此後幾十年工程和學術生涯的基礎。更幸運的是,在台灣這十年中,我結識了內人王迪耐。我們本是鄰居,當年常一同趕搭小火車自台北近郊的新店到市內上學。青梅竹馬,終在兩家父母親和眾親友的祝福下結為夫婦。現在我和迪耐已升入祖父母級,並已歡慶了結婚 40 年紀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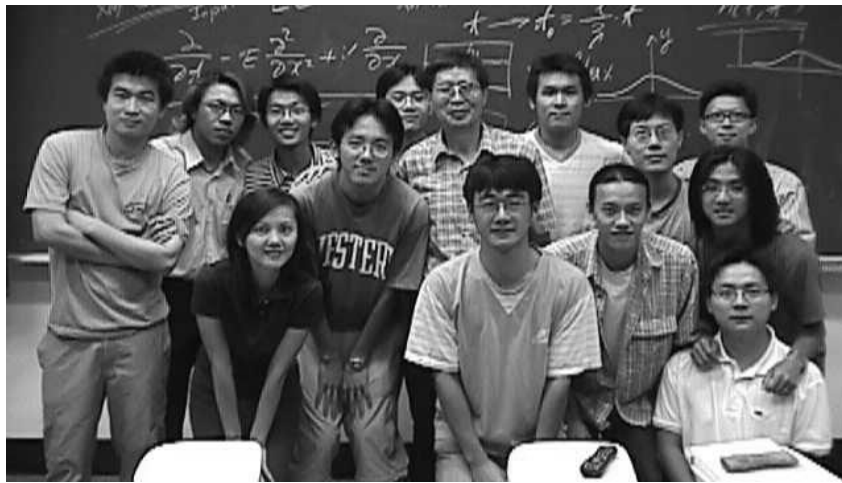
我前後只在台灣生活了 10 年 (1957~1967)。但是這 10 年是我一生中的黃金歲月,存有許多美好的回憶,尤其是台灣的山地。大一暑假我和台大幾十位同學一同前往南投縣叢山峻嶺中的台大實驗林場實習,在實驗林場 5 個營林區之一的合社林區工作生活了兩個多月。在合社林區內抬頭就可以遠眺台灣的第一高峰玉山。台灣第一大河濁水溪的支流陳有蘭溪流經林區,河水清澈見底。大二暑假我又到了山地。這次是參加台灣省公路局的工程實習,被分發到正在施工中的北部橫貫公路第三工務段。北部橫貫公路貫穿桃園縣和宜蘭縣之間的雪山山脈北端。當時公路分成四個工務段由榮民弟兄全面趕工。第三工務段負責自桃園大溪角板山沿著大漢溪河谷的築路工程,位於北部橫貫公路全綫的最高處,沿線風景秀麗。每周輪休的那一天我就和幾位年青同事到附近爬山,享受古木參天的美麗山景。大三暑假到了中部成功嶺上接受預備軍官的入伍基本訓練。在赤日炎炎下的成功嶺緊



張操練，又給於我另一種美好的山野經驗。更巧的是在我台大畢業服預備軍官兵役時又被分發到位於北部橫貫公路起點的大溪三峽憲兵隊。我和台灣的山地實在是很有緣分。

來到美國已匆匆 40 多寒暑，在夏威夷大學任教也已逾 30 年。父母親仍在世的那些年中，我常回台灣和他們團聚。其間台灣各公私機構多次邀請我回國擔任短期諮詢和顧問，讓我有機會參加淡水河污染整治，高雄地區土壤污染調查，翡翠水庫水質維護，澎湖風力推動的海水淡化系統開發，花東外海深層海水資源開發利用等各項工作。我在夏威夷大學每 6 年 1 次的安息年假也大部份都在台灣渡過 - 先後 3 次在台灣大學農業工程系水利組(現改名為生物環境系統工程系)和環境工程研究所擔任客座教授，每次從事大約半年的教學研究工作(附圖 7)。

附圖 (7) 2002 年在台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系任客座教授時與學生合影



我因著旅游及講學開會之便，到過世界各處。但若論山水之美，人物之親，我總覺得世界上任何幽勝美地都比不過我心裡的故鄉。親愛的父母親如今已長眠於台北近郊的墓園；相隔數千里外的南川金佛山下則是劉氏一族的故居。海峽兩岸都是我的故鄉，是我魂繫夢牽之地。

1949年前後，兩百多萬軍民隨國府遷居台灣，造成了一代新台灣人。這是中華民族幾千年歷史中又一次的大遷徙。過去六十多年中新舊移民拼手抵足，共同在這寶島上創造出繁榮興盛的新局面，其中風雲際會，成敗得失就留待我們的後代子孫來判斷吧。

## 後語

童年時在大陸那一段失落的歲月，多年後逐漸從我的記憶中消退。不過其中一些零星片斷，有時仍會湧上我的腦際而且似乎記憶猶新。1949年年底父親單身赴台。對於深愛我的父親“已逃台灣”這件事，當年我的小腦袋完全不能理解，也拒絕接受。我記得在父親走後，我曾好幾次獨自偷偷地溜到住家成都青石橋附近的四川省政府，久久地等在那兒，並定睛從大門往裡看。我深切地盼望父親能從裡面出來，而我也能像往昔一樣，叫著爸爸，跑着迎上去。

六十年過去了，江山自非依舊，而人事更是全非。年前我應四川大學邀請去該校作短期講學。回到小時候舊遊之地的成都，興奮莫名；鄉音，鄉談更覺無比的親切。有空閒時，我就請學生陪我到青石橋一帶逛逛。我更會請他們讓我在仍座落於青石橋原址的四川省政府大門前，多停留一會，讓我能定睛向裡面多看看。我內心深處的感受，他們很難理解。往事已矣，來者可追。我深願有一天海峽兩岸以及海外各地中國人的心中都只有愛，沒有恨；而且都能理解並尊重彼此內心的感受。想來那一天就是中華民族真正大團圓的時候了。

---